

读史问世

短衣携得西凉笛 吹彻龙沙万里秋

——林则徐在新疆身行万里察实情

□潘健 文/图

林则徐一生务实严谨,每到一地,每行一事,必求真相探实情,事先筹谋,周密部署,以实效为上。在新疆伊犁虽属发配,他却丝毫没有蹉跎消沉,反而以前事为师,深入边陲荒漠,“到一城,查一城”,从调查中了解实情,从研究中看清本质,从对策中让民获益,以务实的举措造福新疆百姓。

见微知著似故人

1841年,林则徐被道光帝下旨遣戍新疆伊犁。同年7月,林则徐从浙江镇海出发,踏上前往伊犁的漫长路途。尽管旅程艰辛,且年已56岁,但他依然坚持通过细致入微的调查了解沿途的民生百态。

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六日(1842年8月11日),经历了东河治黄和短暂养病的林则徐从西安出发,在西北丝绸之路旧道上跋涉了4个月,经陕甘河西走廊和新疆天山南北路,抵达流放地伊犁。旅途中他每天撰写日记,详细记录每日的行程、环境与见闻。他既关心民间疾苦,“又行四十里奎墩,居民亦有百余户,闻水利薄,田非膏腴,村墟殊荒陋耳”,也关注地方风土和农业生产,“自入高台境内,田土腴润。泉水流处皆有土木小桥,树林葱蔚,颇似南中野景。其地向产大米,兼多种秫,顷已刈获,颇为丰稔”,同时也了解了当地人“不解农锄不粪田,一经撒种便由天。幸多旷土凭人择,歇两年米种一年”的“轮耕”或“歇耕”的耕作习惯。

到哈密,他除了考证其历史,还赞美其地“土润泉甘,田多树密,可谓乐土”;在塔西河,他记载清代在新疆移民遣犯屯田之事,“此地民居甚盛,闻中漳、泉州人于此耕种者有数百家,皆遣犯子嗣。近来闽、粤遣犯之人亦多分配于此。”

除此之外,林则徐对中国西北地区气候特点、交通状况、民生民俗、货币、驻军和民族关系等内容的客观记录,使他充分了解了西北地区的民生风貌,为后来的治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收集大量风土人情的基础上,林则徐还擅于实证推演。如针对沿途多次出现的“地窝铺”名称,他通过观察,得出“大抵戈壁中,凡有一二土屋处,即皆称地窝铺也”的结论。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九日(1842年12月10日),林则徐抵达伊犁,但因舟车劳顿与水土不服而长期卧病。疾病缠身的林则徐在新疆的三年零两个月时间里,却先后参与了阿齐乌苏垦地、龙口捐修、南疆勘察等重大事务,其间严谨的调查作风为他后续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殚精竭虑穷白首

1844年底,原准备到南疆各地调查屯田情况的伊犁参赞大臣达洪阿临出发时旧疾复发,清廷临时改派林则徐前往阿克苏、乌什、和阗查勘。在“以戍卒而膺特遣,又何敢辞,少陵‘生死向死’之句读之可为于邑耳”的自我鞭策下,他不辞辛苦,事必躬行,务求掌握第一手资料。



伊犁林则徐纪念馆

在《乙巳日记》中,频见“是日共行一百里”“是日路险而长,且多绕越,计行一百六十里,实则不下二百里”“此程计八十里。合两程做一日行,实则百六十里矣”“复行至达旦”等记载,“无一食物可买”“在此无粥,与彝儿露坐而食”的风餐露宿更是常态,只为了能尽快完成调查南疆屯田的任务。

同时,他注重轻车简从,尽可能减少地方官府的负担,“全小江复遣巡捕扎玉祥来迎,欲随伺至喀城。令其先回,不可;又令回子带马十五匹来伺应,坚辞之,始去”“布古尔回城距台二十余里,其阿奇木伯克来台迎接,遣人辞之”“有两城回子阿奇木伯克俱来迎谒,即令归去”。

在途中,除了丈量田地,他还注重调查南疆屯田政策执行的效果。当夜宿巴尔楚克军营,获知行馆外有近年新增的十余家铺户时,他不顾风尘未洗、劳累困顿,连夜赶到商市,“与贸易人谈屯田事”。

通过详细周密的调查,林则徐掌握了大量关于新疆屯田、水利等第一手资料,并通过对新疆水利疏浚、屯田安民历史与现状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主张。

兴修水利是南疆垦荒的首要之事。林则徐到新疆后,就十分关注当地的水利事业,特别深入研究如何因地制宜进行水利建设,促进新疆垦荒屯田。阿齐乌苏荒地曾因缺乏水源而被放弃开垦,林则徐到疆后,伊犁将军布彦泰重启阿齐乌苏荒地开垦。在协办阿齐乌苏荒地垦务时,林则徐认真分析当地水文情况,认为可以将塔什鄂斯坦旧有渠道展宽,接开新渠,引入喀什河水灌溉。他甚至细致研究了引流伊拉里克河水对相邻蒙古游牧地影响的问

题,认为此处“距游牧地尚隔一山,于蒙古生计无碍”,因此可以开垦。

他虚心向当地人民学习,汲取民间智慧,并结合当地人文地理,因势利导,在坎儿井的建设上尤为如此。坎儿井是新疆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种地下水工程,它让不毛之地的沙漠变成了肥沃的绿洲。初见坎儿井时,林则徐就折服于新疆人民的智慧,生动地记述了所见奇观,“二十里许,见沿途多土坑,询其名,曰坎(坎)井,能引水横流者,由南而北,渐引渐高,水从土中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事。此处田土膏腴,岁产木棉无算,皆卡井水利为之也。”

因地制宜解民忧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林则徐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水利开发、招民安户等问题上,不畏艰难,不惧挫折,甚至不惜冒着得罪朝廷的风险,坚持出实招解难题,以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状况,促进新疆的建设发展。

在南疆履勘时,林则徐与全庆一起,秉持农田以水利为首务的理念,着眼于南疆的长远发展。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在库尔勒、伊拉里克等地根据川原形势,因地制宜加以浚导,并利用坎儿井技术,通过新建、拓宽、分支等办法发展水利,解决了制约南疆垦荒的最大难题。时至今日,在吐鲁番部分地区,坎儿井仍被称为“林公井”。

乡土史记

泉州罗溪龟峰岩寺：三教合一

□孙群 文/图



泉州罗溪龟峰岩寺

龟峰岩寺位于泉州市洛江区罗溪镇双溪村,原名莲花庵,始建于北宋开宝年间(968—976年),主祀观音菩萨,明、清及民国时期曾多次进行修缮,现主体殿堂保留清代及民国时的建筑样式,2013年被列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

龟峰岩寺又名盟心堂,据说是因宋代时有多个不同姓氏的家族在此居住,而各家族之间因争夺水源、耕地等资源经常发生纠纷或械斗,后由当地吴氏族人邀请五大姓的族长在寺庙内结盟,约定誓不相侵,如有纷争者须入庙忏悔,而一旦受到外人入侵,则需团结一致进行抗争,于是寺庙被称为盟心堂。这种传统代代相传,如今这里仍保留着良好的乡邻关系。

罗溪镇地处泉州鲤城区北郊,东邻仙游县,西毗南安市,南接马甲镇,北连虹山乡。龟峰岩寺坐落于罗溪盆地中央,海拔140多米的岩峰山坡之上,因这里山形似龟汲水而得名。庙宇坐北朝南,依山傍水,两条东溪支流在山前附近交汇。寺庙采用中轴线布局,轴线上依次为戏台、大雄宝殿、桃源公园,左侧有钟英庙(文庙)、钟楼,右侧有龟峰岩(武庙)、拜亭、



覆盖红灰瓦色瓦,屋脊饰剪粘。

后同心归永好,心中无妄悟真空。”大殿正中供奉三世佛,旁有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三代祖师,直符使者、哪吒太子等塑像,左右厢祀安溪黄氏始祖原高公、开基祖伯高公、三祖清隐公和三尊佛主等。

钟英庙(文庙)为儒家殿堂,一进四合院。门厅为硬山顶,脊刹立宝葫芦,两侧各剪粘一只鱼龙,龙头身短,尾巴高翘,十分呆萌可爱。塌寿为双塌,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插梁式木构架,仰上露明造。明间开门,楹联书:“钟毓启千秋文运,英灵肇百世昌期。”

次间辟圆形石雕窗。外墙以红砖拼贴成“喜”“寿”等字,凹凸不平,颇具肌理效果。水车塔嵌板画人物、山水、楼阁图。檐下施一斗三升拱,垂花、立仙、随梁枋木雕莲瓣、神仙、花鸟,主殿为硬山顶,燕尾脊高翘。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插梁式木构架,仰上露明造。檐下施一跳斗拱,雀替、随梁枋、狮座木雕花鸟、戏狮,梁枋彩画瑞兽花草。殿内供奉孔子、魁星、北斗九皇星君、吕祖、朱衣神等。

龟峰岩(武庙)为道家殿堂,一进四合院。门厅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明间与次间开门,门楣布满浮雕。主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插梁式木构架,仰上露明造。雀替、童柱、随梁枋、狮座金漆木雕花鸟瑞兽。外墙以红砖拼贴成多种几何图形,充满古韵。神龛供奉一尊明代“软身”关帝像,据说肩膀、手肘、腕、腰等关节都能自由活动。殿前有一座新建的拜亭,重檐歇山顶,屋顶饰陶瓦。另外还祀关平、周仓将军与田都元帅。当地人信奉关帝爷,每年节庆时,大家都会为关帝洗脸擦拭,更新衣冠。每年这尊关帝神像会定期在罗溪、虹山等10多个村庄中逐一巡游,要到农历四月十五日才会回龟峰岩。



伊犁林则徐纪念馆内的林则徐坐像

水利工程中尤以龙口水渠工程建设难度最大,“查龙口……应修要工渠宽三丈至三丈七八尺不等,深五六尺至丈余不等,长六里有奇……自五月兴工,至今计期四月有余,除物料不计外,实用工十万有零”,且龙口至黑山头的渠道地势高低落差,沿途碎石夹沙多,渠身易于淤积,成为制约工程的“牛鼻子”。

林则徐为了百姓福祉,不畏艰难,勇挑重担,“遇此开垦要务,尤宜踊跃急公,情愿认修龙口要工”,并“办要工六里有奇,一律完竣,委系十分坚固”,确保了水渠通畅,使南疆获得垦田六十余万亩。

调查研究是进行社会现状分析、深入了解事件本质、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对于调查研究,生活在180年前的林则徐也曾说过“在未尝目击之时,虽有所闻,不敢预存成见”,因此无论是高居庙堂,还是谪贬边疆,他总是坚持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正是这种认真调查、深化研究、解决问题的踏实作风,让他在贬戍边疆、疾病缠身的人生最低谷仍能置个人得失于不顾,怀抱处子之心,全身心投入到南疆的垦荒屯田、修建水利等事业中,“周历南八城,浚水源,辟沟渠,垦田三万七千顷,请给回民耕种,改屯兵为操防”,很好地践行了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理念,为新疆各族人民解难题、办实事,促进了新疆的建设发展,使新疆出现了“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合兵农而一之,岁省国家转输无算,而回民生计亦大裕,为百余年人版图未有之盛”的繁荣景象。

(作者单位:福建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史海钩沉

福州科举家族通贤龚氏

□孙清玲 孙玉凤

通贤龚氏是明清福州的名门望族,主要以科举、循吏、著述和藏书而闻名。明代状元祭酒龚鸣鼎、清代两淮盐运使龚其裕、署理按察使龚霖、知州龚一发、知府龚景瀚及藏书家龚易图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人物。

清光绪九年(1883年)龚葆琛所修的《福州通贤龚氏支谱》是我们了解这个家族的重要资料。通贤龚氏来自莆田,相传其始祖为南宋龚茂良,但后人发现与历史上的龚茂良字号不符,即以有谱可考的处士龚修(字孟修)为第一世祖。龚修于元末自莆田迁福州,居南街通贤境里社(今八一七路东边的巷子即以通贤境得名,称“境巷”,雅化为“锦巷”),世人称之为“通贤龚氏”。

明清两代共繁衍二十代。在科举方面,从第四世开始发力,“其间以孝友忠厚相传,科第簪缨蝉联不断”。清初是该家族的重要转折点,十二世龚其裕是标志性人物。截至清光绪九年(1883年)龚葆琛修谱时,有科举功名者多达91人,共有进士6人、举人8人、监生61人、贡生5人、地方生员11人。与福州其他科举家族相比,其特点是科举中上层(包括举人、进士)不多,仅占15%,但科举底层的基数非常大,占85%。

通贤龚氏的政治业绩主要体现在清朝前期,以龚其裕为代表的祖孙四代主政地方、造福百姓,入祀当地名宦祠并写入清史循良传。龚其裕原为闽县附生,后投资江西军营,清康熙六年(1667年)被任命为瑞州府通判,因在平叛耿精忠军队过程中,龚其裕父子积极练勇、及时供饷,以配合清军收复上高、新昌等城而逐渐受到提拔重用,历任河南怀庆府知府等职。在河南,其裕革除弊政,兴修水利,排队军营干扰,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升两淮盐运使。因在江西任职期间,想方设法回赎被叛军俘获的百姓和士兵,以及捐资安葬战场遗骨等,而入祀江西瑞州吉安各府名宦祠。

其长子龚霖,监生,在父亲任上随军报效而捐捐知县。龚霖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地方长官。在浙江余杭知县任上,“力除宿弊,葺城垣,修文庙”,因断案得体“由是政称最举卓异”,后历任直隶赵州知州、江南松州府知府、署江苏粮储道、直隶保定府知府、陕西甘山道等,终于江西饶九南道,后入祀陕西甘山道名宦祠。

龚一发系龚霖之侄、龚屹之子,父亲早逝,由母亲将他和他弟弟一登抚养成人,历任河南、河北等地知县,官至云南镇南州知州。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河南归德大水,商虞、永夏大饥,他被临时调往虞城善后,“核户口,清囚系,去奸蠹,禁盗贼”,并实行以工代赈,亲自带领百姓日夜奔走,兴修河堤,又捐资修县城、葺桥梁,且当时江南、山东爆发蝗灾,“虞介其中,独不入境”。卸任之后,贫不能行,而邑人投送薪米瓜果,空城相送。死后入祀河南虞城名宦祠。

龚景瀚系龚一发次子,中进士后历任甘肃靖远、平凉知县等职,后升为陕西郿州知州,未赴,遇到“川楚教匪”(指白莲教)肆扰,随营调用,屡立战功,而升为甘肃庆阳府、兰州府知府。由于长期在西北任职,对陕甘的情况非常熟悉,是时又遇到“流贼”蜂起,他仍随军筹划,作出坚壁清野之议,提出建堡寨步步为营之策,得到朝廷的认可,并取得真实成效。因此,死后入祀甘肃兰州府名宦祠和福建省乡贤祠。时人对他的才干、学识评价甚高,如陈寿祺认为“龚海峰之才干器重则诚足为世用”;林昌彝称“闽宦龚海峰太守景瀚留心政治,具经世之才,凡古今因革损益,无不穷源竟委”。

龚景瀚的玄孙龚易图进士及第后,由翰林庶吉士改云南知县,赴任途中经郑州时,遇北方“捻匪充斥”,为督师毛昶熙所器重而截留差遣,此后配合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付捻军和太平天国起义军,扼守运河,屡屡立功,官至湖南布政使,但因广东任内之事被议落职,时51岁。此后回到福州,开启了安适的晚年生活,“日邀知好,以诗酒相娱乐”,光绪十九年(1893年)病逝于福州,年仅59岁。总的来看,龚易图兼具文韬武略之才。

通贤龚氏有读书、爱书、藏书的传统,而十九世龚易图将龚氏藏书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龚易图自幼好书,但为时家道中落,藏书不多,几乎借遍闽中陈家(寿祺)、冯家(缙)、刘家(家镇)的藏书。出山为官,经济好转之后,开始买书、藏书。先是清同治二年(1863年),他开始置书,但因事务缠身,“壮年奔走,知读书之乐,而无读书之功”。同治十二年(1863年),他在烟台担任兵备道兼海关监督时,又购进海宁陈氏遗书3000余种,“复益以历年所积,共计五万卷有奇”,由海道运抵福州。

清光绪三年(1877年),龚易图在职期间告假回闽,在乌石山麓购建乌石山房,并在边上另筑双骏园,用以收藏五万卷图书,随后还对藏书进行校抄,于光绪六年(1880年)与江西杨希闵合撰《乌石山房藏书目录》。

除乌石山房之外,龚易图另有别墅5处:南庄为朱紫坊的武陵别墅、东庄为城内花园弄的芙蓉别岛、今光禄坊的陶舫、近水泊船处的泊台、北庄的三山旧馆,且以三山旧馆最为著名,该园墅位于福州旧城北门的西湖边上,又称“武夷北墅”,大通楼是该园墅的中心建筑。

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又得到闽县刘家“藏均居”藏书二万余卷,于是将这些图书与乌石山房、双骏园及松芝山房的藏书相继转移到大通楼,使大通楼成为福建藏书量最大的藏书楼之一。

民国十四年(1925年),其孙龚纶重新校抄《乌石山房藏书目录》时,称大通楼的藏书已达十余万卷。但随后由于龚氏家道中落,疏于管理,造成藏书大量外流,其中有一部分为今天的福建省图书馆所收购。新中国成立后,大通楼归公,剩余的部分藏书也为省图接管,大通楼藏书成为省图善本古籍的主要来源。